

全媒体生态视域下高校舆情引导与处置机制研究

王迪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舆论声量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必要条件,极大程度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角度与速度,影响了网络公共空间的秩序风尚,并进一步作用于现实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高校作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舆情呈现出载体多元、过程复杂、客体相似、时间关联的特点,为后续引导处理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立足全媒体生态视域,高校当基于自身工作性质与学生心理发展特点探索构建科学的网络舆情引导与处置机制,全面扭转传统舆情处理工作中的被动局面,优化立德树人工作成效,构建成长长期向好、全面向好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优化舆情认知,转变工作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全媒体生态视域下高校舆情处理机制的科学构建有赖于工作理念的创新构建。高校应提升对舆情处理的重视程度,充分认识到舆情由过往自然人参与的有形形态向网络空间多元主体、立体化传播转变的整体格局,形成深入群众、主动作为,利用全媒体传播平台引导、平息不良舆论的工作思路,不断维护校园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正向氛围,进一步提升社会评价满意度与公众信任度,为学生群体健康成长与长远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条件。

一方面,高校应确立舆情危机意识,形成引导与处置相结合、疏通与防治相补充的工作理念。高校须深度明晰当前网络舆论对校方反应的考验,理解、尊重社会公众对舆情所涉事件真相的关注,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整合事件产生缘由与发展脉络,以诚恳的态度、清晰的措辞公开事件信息,并在充分研究事件后制订解决方案,跟进公布处理依据与处理结果,妥善回应公众关注与监督。在舆

情处理过程中,高校相关工作者应秉承谦虚、谨慎、务实的心态,坚决杜绝删帖、禁言等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避免武断偏私、求快求满的处置手段,而应以反应迅速、逻辑清晰、态度端正、过程结果公平的处理全程赢得公众信任,牢牢把握网络舆情后续发展的主导权。

另一方面,高校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舆情应对理念。高校舆情类型多样、过程复杂,并非单一的处理模式或机械的处理原则能够应对。当不利舆情出现时,高校应重视时间成本,联合与舆论事件相关的职能部门,对事件内容与具体发展过程进行专业化探讨,最终制订形成全方位回应公众的系统性处理方案。同时,高校应积极主动向内外沟通,对内缓解教职工与学生群体的担忧焦虑,对外借助全媒体平台澄清事件内容,阻止舆情进一步扩散,修正公众对高校的印象。

提升管理能力,加强队伍建设

高校舆情的完善处理需以人才队伍专业能力的充分发挥为基础。面对全媒体生态背景下日益繁杂的信息传播状况,高校当着重加强舆情处理队伍专业化建设,持续优化工作团队的组成结构,工作态度与信息技能水平,拓展舆情引导管理范畴,切实提高高校舆情处置能力。

一方面,高校应以当前宣传工作队为基础,选拔了解全媒体生态状况、具备舆情引导专业知识的人才,成立专门的舆情管理小组,为高校舆情处理工作确立专业水准。在此基础上,高校可聘请网络媒体技术与公共关系管理的专家、学者为小组成员提供系统的专业培训,使之正视自身在校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确立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形成与高校内外舆论情况、长期发展方向、目标定位相匹配的舆情引导与处置能

力,进而为高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创造和谐健康的良好环境,为高质量人才、潜在人才的流入去除障碍。

另一方面,高校应当拓展舆情引导处置的主体范畴,在专门工作队伍之外培育一批思想先进、意志坚定、价值取向优良的舆论引导者。高校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对热点事件保有极高的关注度,具备参与舆论讨论的热情,能够在网络空间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故高校可增强与网络领袖的沟通交流,鼓励其积极参与事件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发挥号召与引领作用,帮助学校改善网络舆情走向。在此过程中,高校有关部门当特别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思想倾向,不仅要规避学生情绪不稳扩大舆情范围,而且要尽可能避免学生在参与网络讨论的过程中心理健康遭受损害,影响个人生活学习与长远发展,极力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与高校舆情发展趋势持续向好。

创新思政教育,提升媒介素养

高校教职工与学生群体是舆情产生的源头,高校当立足全媒体生态视域,依托思政教育对前述主体进行媒介宣传教育,提升校内人士的思政水平、法治意识与媒介素养。在高校科研、工作、学习过程中,教职工与学生或许会将自身遭受、参与、见证的事件上传到网络空间,有意或无意间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影响群众校园生活与高校声誉。据此,高校应强化源头引导治理,创新思政教学方式与内容,通过案例展示、情景演示等生动方式向各类群体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其建立正当合理的沟通思维与矛盾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减少高校舆情的萌发。同时,高校还应增强过程防治,通过虚假网络信息、偏颇主观描述等内容,帮助教职工与学生群

体提升网络舆论信息辨识能力,避免因信息不全面引发以讹传讹的乱象,有效控制舆情扩散范围。

完善舆情应对,构建预后机制

全媒体生态视域极大地便利了公众对高校的监督,与此同时,其在舆论场景中的扩大特性也难以避免地对高校声誉产生损害,对高校内部管理与长期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高校应充分利用全媒体生态体系,构建“后舆情”处理机制,科学化解除潜在问题与遗留影响。在具体实践中,高校应全面、深度审视自身管理工作缺陷,及时改善其中不科学、不合宜的运行机制,保障校内各类群体的合法权益,减低未来高校舆情产生几率。此外,高校还需在舆情处置工作完成后进行复盘,提升后续舆情处理应对实践能力,构建形成适宜校园特色与发展规律的工作经验,不断打磨形成更加优质的工作模式。

全媒体生态视域为高校舆情引导与处理提供了新的思想方向与实践维度,高校当积极应对舆情挑战,构建对网络时代舆情发展的准确认知,掌握舆情传播扩散规律,不断加强舆情管理队伍专业能力建设,积极提升校内各类主体思政水平与媒介素养,并于处理工作结束后形成“反思—复盘”的预后机制,切实深化自身同各类媒体平台的联系程度,最终形成集舆情源头治理、过程防治、引导处置、预后优化为一体的高质量管理机制,为教职工与学生群体提供良好的价值指引与发展基础,逐步建成优良的高校网络空间。

作者系河北金融学院党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本文系2023年河北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作用机理与路径选择——基于解释学水平理论视角”(GXDJ2023B330)的研究成果

超越时空的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

徐子尧

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情境的改变、思想家们人为推动等等。从古希腊开始,它们便一直是人们争论和探究的重点。本文意在说明,公共精神和公共参与是从古至今根源于人们心中的天性和愿望,是许多思想流派、哲人和学者们所倡导和鼓励的达到个体幸福的必要条件;而积极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是公共精神,更已然成为新时代我国促进社会进步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当务之急。

马克思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涂尔干认为,“除非个人投入社会,否则他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无法完全认识他的本性”。故而,青年人才须将自身的专业发展与公共精神有机结合,彰显职业生涯与个人生命历程中应有的责任伦理与人文关怀,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必然而然”,构建这样的社会公共生活,必然离不开全体青年公共精神的成长。本文将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先论述希腊罗马时期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主义对公民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态度与深层理解,再论述近现代以来东西方学者对公众社会参与的肯定,最后将焦点落实到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对新时代青年群体的重要性。

一、自然且必需的社会参与

根据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里的描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脱离群落居”并不是人类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而仅仅是为了满足生存需求的、被强制的”行为。人之所以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全在于在公共领域中所实践的实际行动和语言的必需性及重要性。在古希腊城邦的背景下,公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和与他人在重要政题上的激烈辩论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满足感。倘若将城邦这一限定语剔除掉,那么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和语言依然是必需且重要的吗?如阿伦特所说,人们的主观感受如果不能通过规范化而被公共领域所接受和包容,它们将很快被抹杀、忘却,并导致人们对自己的存在合理性产生质疑和不确定感。简而言之,人们常说的存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都是建立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的。而事实上,这三者是有先后顺序的,因为有了对自我的承认,才能对与自己相似的个体产生认同,进一步将自己归类为某一特定的群体,即社会学上的“内团体”概念。内团体成员之间将倾向于互惠和利他行为,这使得个体更易于生存。于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有利于生存的基因被保留,相应的行为被鼓励,于是社会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们由于生存的本能而自愿、自然进行的活动。

既然社会参与既是必需和重要的,又是出于自然天性的,那么它理论上应当满足伊壁鸠鲁所言的“自然和必需的快乐”。同时,伊壁鸠鲁本人虽提倡感觉主义,其实却是将理性主义建立在感觉主义之上的,这从他提倡深思熟虑和谨言慎行的快乐便可以推断出来。此时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伊壁鸠鲁的判断原则是理性的,而社会参与客观上符合这一原则,可为什么他反而劝诫人们远离政治与公共生活呢?这涉及到对于他所倡导的感觉主义的进一步理解:一切外物都没有自在价值,价值的本源在于感受。用他的原子偏斜论来解释,便是说原子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客观世界虽然由作为元素、质料的原子组成,但都是作为本质的,唯一形式的原子的映射与投影,而后者便是自由的心灵,也即人的主观感受。因此,与其说抛弃感受而讨论客观事物并不符合伊壁鸠鲁的判断过程,倒不如说对于伊壁鸠鲁而言,离开了主观感受,一切客观事物便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了,也便没有了讨论的客体。

至于伊壁鸠鲁为什么感觉到公共生活并不能为人带来快乐,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城邦的没落,帝国的兴起和社会与政治上的动乱使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家对改变现状无能为力,于是哲学思想的着眼点从向外用力转变为向内用力。因此将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从伊壁鸠鲁的“快乐哲学”中剥离,而断言为了达到最高的善,人们应当逃离公共生活是不科学也不公平的。

二、斯多葛主义中的公共精神

斯多葛学派认为“有德性地生活是一个人唯一的善”,而德性便是自然万物的秩序,也就等于人的理性,所谓天道即天道。由此普遍的理性取代了伊壁鸠鲁所言的没有统一标准的感受,这一理性的普遍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所有人都具有理性,二是理性性内在的高度一致。事实上为人人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斯多葛学派的杰出贡献在于,它迫使从古希腊时代就一直被哲学家们所关注和探讨的应然的“道德政治”完成了从注重统治者个人美德(如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到强调调制与治理的正理性的转变。斯多葛派倡导的自然法和双重忠诚的观念其实是在引导和鼓励人们对自然的法律、现存的政治体制进行审视和反思,以达到调整和完善的目,而这最终本应落实到人民广泛的公共参与和批判上,但因为当时混乱动荡的社会背景而无奈罢休。

尽管后期的斯多葛学派选择了回避政治现实而回归人的内心选择,它的自然法观念仍然对罗马法律的制定有深远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它暗暗契合了罗马人所推崇的“克己奉公、热爱国家和为公众服务的公共精神”。这一普世性与超时空性的正义原则敦促人们从宏观的、道德伦理与合法行为的角度

思考和行动,为克己奉公;高于一切的自然正义的准则被用于国家实定法的制订依据,使人人依据理性行事便合乎社会规范,故而热爱国家;由自然理性控制的社会和谐状态是为个人的自私自利所破坏,因此提倡利他,从而为公众服务。综上可见,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仍是根源于公共精神的。

三、公共领域与社会参与

近现代以来,关于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的概念界定和作用探究上。与古典思想中市民社会被视作与原始的、家庭的生存状态相对立的一种状态不同,黑格尔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独有领域的概念。无论如何,这些理论关注都逐步地使研究者的视角聚焦到了平等的公共参与、民众对公共议题自愿和理性的讨论与批判等方面。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不同而同地认为,市民社会具有强大的政治整合功能,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公众的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对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这对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体有什么益处呢?

学者赵琴认为,公共领域的“终极理想和恒久魅力”在于其“指向人类精神团契的永恒关怀功能”和它为参与其中的人们所营造出的共同追求和精神归属。这里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兴起为例进行详细解释。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并不仅仅能够存储图书、为普通民众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以起到教化作用,它同时还营造了一个建立在平等之上的、文化共享基础上的自由社交平台,并且由于书籍的多样性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常常延伸到政治、经济等领域,因此是公共领域分化出的重要地点之一。在这一公共领域中,人们与陌生人共享书籍,交换意见,“悄然而生礼义待人”之态度、互助之精神与爱群之心”由于公共书籍之公共性,又生出社会责任感,进而生出利他主义的精神。这无不在说公共性对于个体自身品格的完善、价值的提升的重要作用,而这些必将诱导群体中强大的社会关怀力,反过来使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获得精神上的认同与满足。

四、社会参与之于新时代青年

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是对现存社会结构和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拒绝与对抗;后来,随着青年亚文化的不断发展,其抵抗性渐渐模糊,但仍然可以被视作一种当代青年“对政治公共生活的话语通道”;其活动场域也开始由现实世界转向虚拟的网络空间,被称为“替代性公共领域”。在替代性公共领域中,青年群体通常以较为娱乐化的方式,通过调侃、戏谑、反语等等异于传统社会参与话语的形式来表达对某一公共议题的支持或反对。在这种新型公共讨论中,青年们对既存的文化符号进行解构和再建

构,将真切的感觉与看法符号化或进行编码,这一自主和创新的過程提高了青年对公共事务的能动性,促使他们对公共信息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积极反思,并通过再呈现为他们赋予新的意义和内涵。事实上,青年线上的公共参与频率越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参与程度也将越高,即在虚拟世界中的参与与文化正在向真实世界延伸”。至于传统的社会参与形式对青年群体的积极影响,则表现在参与者显著的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上。研究表明,广泛参与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公共事务的青年,在自我的价值认同、行为的一致性,与他人的合作与协调能力等公共责任等许多方面相较于同龄人而言有明显优势;此外,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的社会参与程度也越来越被我国教育部、高校负责人等重视。可见,无论是“替代性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讨论,还是现实中传统的社会参与形式,都对青年人的综合能力和未来的生涯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公共生活的必然要求,公共精神、公共关怀与公共理性等理应为新时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价值指向。

林尚立提出:“公民精神的培育,不能简单地从道德的要求出发,而要从权利和责任意识出发,敢于在具有价值优先性的个体权利面前强调公共利益的价值与意义,并努力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一系列社会公共转型问题逐渐进入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视野中。在国家大力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需要发挥国家制度本身的优势,还需要构建德才兼备的人才体系。故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培育青年人才“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激发青年人才的公共意识,重构社会成员的公共价值理性以应对社会公共性问题。

综合全文,尽管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在不同的时空和人文背景下的价值内涵和侧重方向有所差异,但其总体的趋势是被强调、被注重和被提倡的,并且在个体层面上的意义从未被忽略。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是人类必需且重要的自然本性,是自然法观念的内在要求,是精神上的归属与满足感的重要来源,于新时代青年而言更是至关重要,故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须注重公共价值理性的培育氛围和精神引领。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是个体实现自我、获得幸福的重要途径,并且是最终达到人类至高福祉的基本要素。它们如此重要,以至于跨越数千年、超越一切地域的界限,都始终是人类目光的焦点和光辉耀人的所在。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文化是立国之要,是发展之要,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形态决定着国家发展的长期前景,国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受认可程度决定着国家在世界竞争中的综合实力与内在潜力。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文化的核心要素,其对外传播能推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极大提升,为中国声音与中国力量的持续扩散提供强劲动力,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与综合影响长期向好发展,已成为激烈国际竞争中中国向前挺进、构建强竞争力重点工作的之一。

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价值

红色文化历经革命战争时期、过渡时期、十年探索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是以人民群众以身许国,为中华民族发展艰苦奋斗为代表的一系列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总和。红色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蕴含着丰富的民族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内涵。直至今日,红色文化仍不断丰富充实自身的价值体系,凭借自身先进性与优越性成为中华文化的关键组成要素。在此背景下,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成效极大程度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认知,影响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构建成果,决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安全程度。

1.塑造国家形象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国构建和谐稳定国际关系、深度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基础,能够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部分国家和团体对中国红色政权的认知存在偏差,较大程度影响了中国国际形象的确立。立足当前国际发展趋势,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有效推进能够进一步展现红色文化中蕴含的不懈奋斗、团结互助、追求理想与自由等代表性优质价值观念,带动不同立场主体真实了解、接纳、认同红色文化,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诸多偏见,助力国家形象的良好塑造。

2.提升国际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是国际事务处理与国际环境变化过程中,一国之态度、行为对其他国家与国际整体发展形势的引导与改造作用。高水平国际影响力的构建需以一国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综合国力的强势发展为前提。当前,中国在管理体制、军工科技、高新技术、基础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骄人成绩,但国家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仍存在明显劣势,不利于国际事件的深度参与与有效引导。中国着重发力,优化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工作,能够增强中国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的国际吸引力与影响力,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体制与国家文化的深度认可,从而推动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3.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展现在军事科技等有形层面,而且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无形交锋成为国家之间相互攻守较量的实质展现。日韩近邻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开放多元的网络空间为载体,企图利用其文化娱乐方面的发展优势,向中国国民输出其影视产品中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从而树立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强势化地位。中国加强以红色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对外宣传工作,能够有效避免外来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破坏影响,进而保障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安全性,长期保有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方式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工作中形成的思想文化精华,是汇聚诸多革命、发展阶段奋进精神的优良写照。长期以来,红色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持续、丰润的滋养,并不断吸纳更具民族代表性及时代价值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仍需锲而不舍推动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全方位审视考量当前传播工作中的不足部分,结合时代发展进程,构建极具创新精神与传播吸引力的有效传播方式,充分彰显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形成国际社会的新一轮思想文化热潮。

1.改善传播理念,增强传播成效

宣传部应当立足时代视角,改善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整体工作理念,构建更加科学的传播生态体系与宣传工作模式。一方面,相关宣传主体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进一步发掘红色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样态与真实故事,向受众呈现其中蕴含的同人类智慧、信念、情感共通的整体价值精神,实现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情感共鸣与精神共振,进而获取各国人民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宣传部门应区分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受众,结合其民俗思想、宗教信仰、受教育情况等确立相应的传播工作模式,进而完成传播渠道、媒介形态、互动方式等红色文化传播工作的进一步扩充完善。如面向欧美发达国家开展宣传工作时,更倾向于选取红色文化中能够展现人民群众追求解放与自由、积极发展人民权益的内容,撰写文章、制作视频进行线上宣传互动;面向亚非拉国民,则可以提供具有抗争精神、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的传统媒体宣传内容。在此基础上,宣传部门还需不断调整宣传方式与内容,依据各国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变迁、民众价值观念等变化及时变更传播策略,从而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实效性,为红色文化长期发展基础上传播成效的切实显现奠定扎实基础。

2.优化内容传达,构建科学切入点

新时代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应当优化内容传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传播内容,构建以受众视角为切入点的传播方式,切实提升传播工作成效。一方面,宣传部门应以受众的精神情感需求为基点,构建形成满足各国群众认知观念与价值取向的红色文化故事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打造相对应的红色旅游线路,发展红色文化创意产业,满足红色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不同受众的体验与需求。另一方面,宣传部门需格外重视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语言转化工作,树立以微观带动宏观呈现,以受众开启文化叙事的传达模式。在具体实践中,宣传工作者当选取更符合目标受众语言的叙述逻辑,避免由大及小的传统红色文化讲述方式,而多以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体的思想情感、命运选择为出发点,引发受众群体对红色文化的思考、研究与认同,并通过不同时期多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形成全方位的历史视角与故事发展印证,构建立体化的红色文化世界,形成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3.创新宣传渠道,拓展宣传范围

智能互联技术与融合媒体的广泛应用能够为新时期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构建更加多元、新奇的传播途径,拓宽受众群体及其文化了解范围,提升国际社会受众群体的信息获取体验,优化传播工作成效。一方面,宣传部门应把握官方交流机会,通过外交工作展现国家气质形象,吸引受众群体持续关注中国并对红色文化进行深入探索,为后续文化宣传工作创建良好的基础条件。同时,宣传部门应加强国内外各主流媒体平台的账号运营,积极展现红色文化的各类信息及内涵精神,增加同粉丝群体的互动频度,深化该群体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程度。另一方面,宣传部门应制作适应不同群体的红色文化宣传产品,借助文字、图片、音视频、虚拟现实等多元传播媒介,结合大数据技术与用户画像在多元媒体平台进行针对性投放,建立传统媒体与现代化传播相结合、覆盖众多主流群体的跨平台立体化传播格局,从而实现文化传播工作精准度、转化率的大幅提升。

作者系嘉兴南湖学院讲师;本文系嘉兴南湖学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背景下,《嘉兴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研究》(项目编号:QD63220007)、《2024嘉兴南湖学院:基于语料库的中非报道话语分析及国家形象建构》项目编号:623020YW)的研究成果

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价值和方式

赵红丹

